

古代陶泥文明告诉今人什么

□ 方汉文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研究，更好地认识中华文明，加强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中国学者提出的“陶泥文明”多元综合世界文明起源与阶段划分学说，冲击了西方学者占统治地位的“文明社会和字母”理论，向构建历史主义的文明起源与发展阶段学说迈出坚实的一步。

中国陶泥文明的发掘

1920年，中国考古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史前石器，判断这里可能是石器时代遗址，可能有重大发现。考古队员刘长山长期从事古代文物采集，经验丰富，立即将所有样品共600余件带到了地质调查所。指导调查的瑞典专家安特生得到这些第一手资料后，于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人在仰韶村进行挖掘，发现大批石器、骨器与陶器，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存在。这一文化以仰韶村命名，最主要的出土文物是中国彩陶，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中第一个正式命名的文化遗址。这一考古挖掘与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世界性陶泥文明时代存在的证据，改写了西方文明阶段划分中没有陶泥文明的缺失。历史主义的原则是以当时社会的语境来评价与判断事物。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者确立了陶泥时代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新观念。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之一是文字的形成，而在陶泥时代，形成了以中国陶泥刻符与甲骨文字为代表的文字，这是中国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从世界范围来看，其中并不排除腓尼基字母等拼音字母，但陶泥时代的多元综合因素是人类文明新阶段的主要动力，而并非仅仅是西方自我中心的“文明社会—注音字母”理论。

古代世界的陶泥文明带

从距今10000余年到5000年前，从新石器到金属工具应用之前，已经

有一条巨大的陶泥文明带横亘在地球上，古代陶器与甲骨的刻符文字与泥板文书是人类意识与精神飞跃的标志，它分布在南北半球的北纬20度到40度之间，东起中国的长江与黄河流域，南端是喜马拉雅山南坡下的印度河平原，向西穿越伊朗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直达到地中海岸边，甚至在欧洲中部与中美洲地区，也可以看到大量的古代陶泥文明遗址。

陶泥文明最突出的特征有三点：农业生产的技术从萌发到成熟；以古代国家为代表的社会组织的建立；语言与书写文字体系的发明。以上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综合观念，它联贯起了世界主要文明起源地。古代中国主要包括仰韶文化（其中有二里头文化到安阳甲骨文的延续）、龙山文化（大汶口陶文）、良渚文化（黑陶刻符）等不同时期的遗址与出土文献。世界文明史上，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陶泥文字出现较早，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最早于公元前3000年前使用楔形文字，写于泥板之上，史称泥板文书。从陶文到殷商甲骨文字再到西周的甲骨与金文，则是中国文明最具特色的重要创造。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陶甲金（青铜）都是人类加工制作的，不像石器那样是自然存在经人类简单加工而成。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陶泥甲骨都是真正的人类创造物。最有价值的是，在陶泥砖瓦器具上，出现了最早的刻符文字系统。恩格斯曾经以文字产生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最早有书写文字的陶泥文明应当是世界古代文明的重要阶段。

古代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500年前后。1922年，哈拉巴与摩亨达罗文明遗址最早在哈拉巴发掘，后来在摩亨达罗取得突破性进展，确定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文明遗址，由众多的城市聚落所组成，印度河流域城邦群中已经使用古代文字，这种文字体系庞大，约有符号400多个。书写方式并不是很有规律，有时从左向右，有时从右向左，说明这种

文字系统在当时尚不够成熟。

古代埃及象形文字一般认为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即埃及第一王朝时代，这是刻写在泥板文书上最早的文字之一。

欧洲爱琴海的居民们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并且书写在泥板上，这种书写方式可能受益于美索不达米亚人，从西亚到欧洲，主要书写工具都是泥板。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700年，在地中海周边出现了象形文字。而拼音字母的创造者则是腓尼基人，即以后的突尼斯人。西方文明社会阶段划分理论中盛行一种“文明社会与字母”理论，这是典型的字母音位主义学说，以西方拼音文字作为人类文明之始，而将陶泥文明时代最主要的楔形文字与中国陶文刻符与甲骨文排除在外，不承认其作为文明社会文字的代表，是完全错误的。

公元前1700年前后，克里特人创造了线形文字A，以后迈锡尼人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两种文字都刻写在泥板上，后者称为线形文字B，其中迈锡尼人创造的线形文字B已经被英国学者文特里斯和柴德威克所破解，泥板文书记录了当时社会的奴隶制度、土地的分配、国家组织等重要历史。这种文字是最早的古代希腊语言，这就表明古代希腊语至少有3000年以上历史。但这种文字也并非如今的“注音字母”，其文明价值也未必能超越其他文字，充其量是陶泥文明之一。正如美国人保罗·麦克金德里克所说：“至此，线形文字的被解读成为一个确定的事实，希腊语也因此有了3300年的历史，其悠久程度只有中文可以与之媲美。”

公元前3300年前后，正值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第四期，泥板文书开始大规模流行，文书中的文字形状像一个楔子，人们取用拉丁文命名它为“楔形文字”（cuneiform）。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都用泥板文书。这种文字迅速流传，遍布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埃及、印度等各地。古代世界首次出现了一种大范围内的统一文字，取代了埃及、印度、伊朗

等地的原始文字，成为书写公文、写作诗歌、记录历史的规范文字，是陶泥文明的代表。

中国陶文在世界陶泥文明中的地位

中国陶泥时代文字是多元的，古代陶文刻符中既有字母陶文也有象形陶文，各有自己的发展阶段。我们将其总体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的原始刻符阶段。直到仰韶文化的陶文刻符中，正式出现了具有原始表意作用的陶文符号。第二阶段是公元前3000年的龙山文化期，特别是大汶口陶文中象形与表意符号数量增多，从原始表意刻符向象形表意刻符转化。第三阶段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夏商王朝，陶文融入甲骨文的体系之中，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字体系，与美索不达米亚泥板文书并列成为陶泥文明时代的标志。

大约公元前3000年前后，陶泥文明在世界范围内进入兴盛期。在中国，直到殷商甲骨文之后，西周时才以金文为代表进入青铜时代。在国外，公元前1800年前后，汉谟拉比时期的巴比伦才进入了青铜器时代。其后不久，赫梯人的铁器生产带动了世界的金属器具革命。

陶泥时代的农业生产、城邦与宫殿的建筑、国家制度、法律、文字符号等多元文明因素全部具备。陶泥时代的埃及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一神教的，埃及人以太阳神阿蒙（Amen）为主神，这就是原始的一神教。另一种重要的一神教犹太教也是同时期形成，中国的天帝思想也产生于此时，足见陶泥时代的精神信仰也是文明主体形成的关键因素。

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所形成的陶泥文明历史实践，印证了中华文明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重要论断，成就了中国文明话语的建构。

从考古看文明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在从事理论研究的同时，也为创立无产阶级政党而努力。他们亲自指导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且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了政治纲领——《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准备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准备工作，实际上是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创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开始的。委员会以通信的方式，建立起一个范围广阔的国际共产主义信息交流和宣传网络，加强了各国共产主义者和工人组织的联系，使各国社会主义者摆脱了民族局限性。同时，还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教育了工人运动骨干，培育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力量。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中心和政治中心。

为了把工人运动置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三次批判和斗争。

一是同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的斗争。魏特林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理论家和活动家，他的思想对启发工人觉悟作出了贡献，但其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譬如粗陋的平均主义、浓厚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色彩、封闭的宗派主义、过时的密谋主张等。当魏特林应马克思、恩格斯之邀加入通讯委员会后，他拒绝用科学社会主义修正自己的学说，而且在委员会内部从事分裂活动。1846年3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在委员会会议上深刻批判了魏特林的空想社会主义，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魏特林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

二是同“真正的社会主义”海尔曼·克利盖的斗争。当时克利盖在美国创办《人民论坛报》，宣传他的“爱”的社会主义，鼓吹在地球上建设“充满天国的爱的村镇”。他认为，废除土地垄断，分给每个公民一小块土地，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这些主张与科学社会主义背道而驰，必然会对工人运动产生误导。马克思、恩格斯于1846年5—6月起草了两份决议，批驳了他的所谓超越阶级的爱和小资产阶级改革派的主张，对克利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导致克利盖的拥护者纷纷离开，报纸也办不下去了。

三是同“真正的社会主义”格律恩的论战。1846年初，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准备同魏特林主义划清界限，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乘虚而入。他大肆鼓吹“蒲鲁东协作社计划”，主张由各行各业手工业者组成协作社大货栈，货源由社员提供并按原料价格和劳动付出议价。恩格斯从工人阶级一贫如洗的现实出发，指出了这一计划的荒谬性。恩格斯用财产公有驳斥了美化私有制、保存私有财产的各种主张，主张用暴力革命取代一切密谋主义和温情主义，从而与他们划清了界限。

在这些批判和论证过程中，科学社会主义得到了传播，特别是促使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转向社会主义，为共产党组织的成立提供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

从正义者同盟到共产主义者同盟

正义者同盟，前身是一个流亡法国的德国手工业无产者的组织——德意志人民联盟。1836年其左翼分裂出来组成正义者同盟。1839年5月正义者同盟参加了四季社发动的起义，失败后其领导人被监禁、驱逐出境，他们到伦敦重新恢复同盟组织。正义者同盟具有浓郁的帮会性质，成员主要由流亡在外的德国裁缝、木匠、钟表匠、排字工人等手工业者组成，同盟在法国、瑞士和德国也有支部。他们一度信奉魏特林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等。19世纪40年代中期，同盟领导人约瑟夫·莫尔等人认识了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下下决心改组同盟，并请求马克思、恩格斯帮助制定纲领。

1847年1月，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约瑟夫·莫尔代表同盟专程到布鲁塞尔、巴黎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参加同盟，帮助同盟起草宣言、实现改组。马克思、恩格斯接受邀请参加同盟。1847年6月2—9日，正义者同盟举行

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 李志勇

第一次代表大会，恩格斯参会，马克思由于经费紧张未能成行。这次会议上，正义者同盟改称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人人皆兄弟”，通过了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草案）。这次大会，把一个狭隘的工人小团体变成了地跨英、法、德、比、瑞士等国家的国际性共产主义组织。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有300多人参会。因为很多人白天还要工作，会议只能晚上开，并因此延续了10天。在10天的议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阐释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过10天的辩论，这些代表终于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新理论和新原则，历史上第一个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大会委托，起草了新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制定同盟纲领

《共产党宣言》的前身有恩格斯写的两个版本。第一份是提交给1847年6月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一大讨论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第二份是提交给1847年11月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二大讨论的《共产主义原理》。《共产主义原理》为《共产党宣言》的诞生提供了大体思路框架和基本思想原理。

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首次印数也只有几百册。正好赶上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油墨未干的书籍立即分发到各国的同盟盟员手里，成为工人的思想武器。

《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这本书第一次完整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资本主义，得出“两个必然”的结论，当时的表述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们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靠无产阶级革命，实行人民民主，与旧的所有制和旧观念彻底决裂；这一切，都离不开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共产党组织的纲领，它把那个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讲清楚了，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从此，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以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以最终获得“整个世界”为奋斗目标。同盟高举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旗帜，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航程。



西学东渐中严复的译介实践

□ 李茗茗

西学东渐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学术成果从明朝后期到近代向中国渐进式传播的历史性过程。其中，两次翻译西方经典著述的高潮是西学东渐的重要构成部分。第一次是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传教的同时与我国的儒士一道翻译基督教经典和西方科技文献；第二次是清末民初，西学翻译逐步实现了从以外为主、合作译介到我国儒士独立译介的转变，内容更是涵盖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教育学、文学、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

严复是最早比较系统地将西学译介到中国的启蒙思想家，被称为“中国西学第一人”。严复出身医学世家，在福州船政学堂求学时期，就接触和学习了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光绪三年（1877），严复赴英国公派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在英国留学时，正值进化论流传的时期，他广泛地阅读了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著作，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严复译介的内容涉猎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引领和助推了西学翻译的热潮。

苦思救国图存之道

鸦片战争之后，社会动乱，民生凋敝，人民对清朝的腐败无能怨声载道。加之西方列强和新兴东亚强国日本的重重侵略和勒索，民族危机空前严峻。为了摆脱此种困境，一些有识

之士走出闭关锁国的泥潭，纷纷把目光转向西方，想方设法地接触、接纳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和进步思想。

此时，归国后的严复，直观地对比西洋与华夏，一边经济稳定和社会繁荣，一边落后贫困且思想封闭。如此情境，让他更急切地想去思考、分析和探究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寻找“中西学问之异同”，并准备着手译介西方著作，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传入中国，以探求中国富强之道。

译介西学开启民智之路

为挽救国家危亡，严复走上了翻译西学开启民智的道路，致力于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哲学思想的译介。在《天演论》序中，严复一语中的地指出了他介绍西洋学术思想的特定的历史文化目的：“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在亚当·斯密《原富》例言中，最足以表明此目的的即为：“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倖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不仅如此，严复还从《天演论》万物的发展变化都是要遵循“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中，联系到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和国家的历史趋向。他向国人发出了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呐喊，指出再不变法将循优胜劣汰之规律而亡国亡种，以此来唤起民众的觉醒。西学东渐中，严复相关译介的出版使当时处于“知识饥荒”的中国知识界如获至宝，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以当时中国之“需”为本，以精审卓识的态度选择传播书目、介绍西洋学术思想。为更好地实现“译介启民智、图自强”之目标，严复先后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后由其他译者改译名为《国富论》）、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后由其他译者改名为《论法的精神》）等一批西学名著。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严复提出了他的政治理念和教育思想，希冀维新自强以抗击侵略者，祈望能通过国民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实现国家的富强。每翻译一书，严复都有着“考镜”之深远用意，即一方面介绍西学，一方面不忘发挥“国故”。在《穆勒名学》中，严复将穆勒逻辑思维引进并传播，为中国文化革故鼎新提供了逻辑工具，为国人涵养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提供了一种路径。

力求实现“信、达、雅”的译介之魂

严复秉承着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在《天演论》译者“例言”中，他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这篇“例言”，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提出的“信、达、雅”三标准，是我国翻译史上的首创。鲁迅先生对严复的翻译评价颇高，他在《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中特别谈到了严复的翻译，对严复翻译的《天演